发现·运河

大运河不仅是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还是一条红色之河。在王维屯乡村记忆中心，把那些老物件里藏着的故事连在一起，就是一幅惊心动魄的革命画卷

红色运河记忆：划着凌排送军粮

杨金丽 魏志广 陈立新 杨海利 摄影报道

杨植正（前）边介绍老物件，边讲解其中蕴含的红色故事。

青县段大运河东岸，绿树掩映中，有个普通的村庄：青县马厂镇王维屯村。村里有个乡村记忆中心，里面藏了不少宝贝，我们沿着运河一路迤逦来访。

村子里房舍整洁，广场敞阔，村路两边电线杆上挂着一串串红灯笼，不少村民已住进了楼房，一派新农村新风光新气象。绿树林荫中，一座斑驳古色的“王维屯乡村记忆中心”赫然眼前。

走进其中，目力所及都是老物件：碾子、大车、扁担、木桶、老家具、货郎担、剃头净面具、还有各式各样的灯具。

给我们做向导的，是77岁的杨植正。杨植正是青县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有意思的是，老人每介绍一个物件，必说上一段故事，这故事还都跟大运河、跟红色文化有关。

工具箱秘密传播党的早期声音

展室中陈列着很多过去人们使用的笼屉、食盒，以及现在人们很少见到的张箩匠喊板、马尾箩、工具箱等器皿。杨植正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声音，就是通过它们秘密传播的。

1937年初，定州籍共产党员刘德太受党组织派遣，以出售眼药为名来到青县北部，秘密传播马列主义，物色共产党员人选。青县曹寺村人樊云峰，家境贫寒，从十几岁就外出扛活，后来拜师学习张马尾箩、修笼屉。出师后经常在青县北部串乡做买卖，后来结识了刘德太。二人情投意合，关系密切。后来，刘德太告诉他自己是中共党员，对他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并派他到马厂兵营散发革命传单。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937年6月，在青县南王庄大车店里，刘德太介绍樊云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樊云峰成为青县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樊云峰入党后，与刘德太保持单线联系，接受刘德太的直接领导。他利用到马厂兵营等地张马尾箩、修笼屉的机会，将刘德太事先写好的革命传单藏在工具箱内，秘密散发张贴出去。樊云峰每次到马厂兵营散发或张贴传单，刘德太都在附近的仁和镇等候。

透过这些老物件，我们仿佛穿越时光，看到一位张箩匠，戴着草帽、扛着工具箱，行走在运河两岸。张箩、修笼屉只是一种身份的掩护，党的早期声音就这样在青县一带秘密传播。

那盏刻有“驱逐日寇”的油灯

陈列室中收藏着不少油灯，有的是狮子型的，有的是侍女俑造型的，有的是小老鼠上灯台的，有的是莲花状的，有的如玉净瓶般又细又长、姿态各异，简直是一个小型的油灯博览会。在密密麻麻的油灯中，杨植正拿出一盏其貌不扬的油灯，指着上面的文字说：“这可不是一盏简单的油灯，它是抗日战争的最好见证。”

这盏油灯通体黑青色，造型简单，油灯两头都是圆盘，上小下大，中间有圆柱相连。仔细看，圆柱上刻有“驱逐日寇”四字。杨植正说：“抗日战争时期，青县一带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老百姓不甘心做亡国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挖地道、埋地雷、截敌船、修筑高房堡垒，与日伪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盏灯的后人说，这是他们家在挖地道时，放在地道里照明用的。后来抗战胜利后，地道废弃不用了，这盏灯也从地下拿了上来。”

杨植正说，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为了减少伤亡，很多百姓家挖有地道，地道口直通村外。这样既可掩护八路军干部，又能储藏粮米物品，以防被日伪军搜刮一空。这盏油灯不大，“驱逐日寇”四个字却不小，刻写得苍劲有力。幽暗的地道里，独燃着一盏“驱逐日寇”的油灯，可见抗战的艰辛与恶劣，更可见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念。

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

老纺线机、织布机、鞋夹杆、小推车、油灯……每经过一个老物件，杨植正总能讲上一段红色的故事：“这是挖地道打鬼子用的工具，这是战时支前用的小推车，这是做军鞋时支的鞋夹杆，这是在运河上用来传递情报的伯公灯，纺线机纺出来的线、织布机织出来的布用来做了军装……”

杨植正介绍，青沧一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了八路军，1947年青沧战役后，这一带就成了解放区，人们觉悟高，参加拥军支前活动很踊跃。他引用当地老百姓的一首民谣，来说明当时人们的支前热情是多么高涨：“最后一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伤员上；最后一个儿，扛枪上战场。”

划着凌排送军粮

在石碾旁，杨植正一边介绍石碾的用途，一边讲起平津战役打响前，青沧人民支前的动人故事。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几十万部队迅速入关，包围平津。为了保证补给，解放区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青沧人民用碾子磨面，做成军粮，通过运河送往平津。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运河上结冰后，王维屯村及附近周边村民们就用凌排运军粮。”说着，老人拿起了放在一侧的一个工具说：“这叫冰锄子，木柄下装有铁制的锥型器。运军粮的凌排是特制的，面积比普通的大，运粮人站在凌排中央，用冰锄子在运河冰面上划行。听老人们说，当年在运河上，划着凌排送军粮的人很多，场面蔚为壮观。”

杨植正说，近年来，随着农民们搬进新民居，过上好日子，老物件逐渐失去了作用。有感于此，王维屯村决定建立乡村记忆中心，把王维屯及附近村民们不用的这些老物件收藏到一起，进行展示。

展览馆里还收藏了不少老门窗、钟表、匾额、楹联等老物件。每一个老物件，看似陈旧，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或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雕有福禄寿喜窗棂的门窗、运河人家使用的扁担、木桶、木盆、鱼叉、鱼虾篓、轮式人畜提水车、破冰工具等。它们展示了运河人家的生产生活状况，隐藏着丰富的运河秘语。

追寻红色印迹 不忘合作初心

本报记者 周红红

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探寻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5月6日至10日，民革沧州市委组织部分党员赴上海、嘉兴等地参观学习，观故居，忆初心，汲取奋进的精神力量。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长的见证者，红色印记遍布城市角落。

位于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是一幢老上海风格的二层小楼，青砖黛瓦，质朴厚重。在这条老街中，看起来那么普通，然而正是它，见证了中国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热血青年，在中国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代表全国53名共产党员，在这里秘密开会，通过党纲和决议。他们慷慨陈词、豪情满怀，立誓要改天换地，捍卫祖国的万里河山。

相距不过1.3公里，绿树掩映着另一幢老建筑，这里是中共“二大”会址。这次大会有许多历史性的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党章……这里的空气因历史的厚重而肃穆庄严，这里的一砖一瓦因伟人的指点江山而熠熠生辉。

参观完“一大”“二大”会址，他们又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四行仓库纪念馆。当年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还被拍成电影《八佰》。虽然人们对那场战争的惨烈都非常了解，但当看到墙上密集的弹孔和硕大的窟窿时，还是禁不住热泪长流。他们说，硝烟远逝，精神永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不会忘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要牢记历史、奋力前行、兴我中华。

离开上海，赶往嘉兴南湖，去拜谒那条见证中国命运的红船。碧波荡漾、红船静泊，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在这条船上开会、唱国际歌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民革前辈故居是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传承爱国主义精神和宣传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载体。几天时间里，他们先后参观了孙中山、宋庆龄、柳亚子、朱学范、钱昌照、沈均儒、茅盾、王昆仑等多位爱国先贤的故居，收获颇丰。

民革沧州市委驻会副主委杨国忠感慨地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组织这次活动，意义重大。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我们一定会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职能，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41年前，一位县级干部顶住各方压力，率先实施农业“大包干”，发出我国农村改革的先声，却积劳成疾，倒在了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土地上

关金钟：吴桥改革之路的先行者

本报记者 杨金丽

人物简介：

关金钟（1925年—1980年），吴桥人，1946年入党，早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南皮、中捷、吴桥等地工作。1979年担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期间，带动当地人民率先实行“大包干”，最终积劳成疾，倒在了这片土地上。

闯出一条路来！

在吴桥，说起关金钟，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会情不自禁地提到一个词：“关金钟——大包干——上棉花”。虽然他在吴桥工作的时间不到两年，但他带动当地老百姓率先实施农业“大包干”，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

关金钟是吴桥人。早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在南皮、中捷等地工作。1959年全国“政法”战线英模会上，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

1979年春，关金钟以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的身份主持吴桥工作。踏上家乡的土地，他的心一阵阵刺痛：全县469个大队，只有百分之四十勉强维持温饱。

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统一县委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农村实行“大包干”。

走访中，前郭村自己摸索实行的“五定一奖”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他眼前一亮：这颗火种，只要大风一吹，一定会在吴桥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关金钟正式进驻前郭蹲点。吃住在前郭，“帅帐”设在大队部的破院土房里——他要把前郭的做法在全县推广。

关金钟认定这是一条解放农民积极性的必由之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一个实行“大包干”加棉花生产的思路，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成熟。

顶着压力，上！

改革之路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仍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河北省是受极左思想影响的重灾区。

“远学小岗，近学前郭，包干到户，大胆改革。”1979年7月20日，关金钟此话一出，一下炸了锅。只有少数干部支持他，大多数干部思想还转不过弯儿来，担心政治出问题。

当年8月24日，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关金钟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党的现行政策落到实处。他越说越激动，一把摘下头上的帽子，往台上一摔，激动地说：“分田到户，就这样干了！如果错了，我负责任。我不怕丢乌纱帽！”沉寂片刻，会场上突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关金钟（左二）在田地里和农民了解情况

“大包干”迅速在全县蔓延开来。但在冀鲁交界的沟店铺大桥上，在德州宁津、陵县农村的大街上、电线杆上，却挂上了标语：坚决抵制吴桥资本主义复辟风。

上级有关领导找关金钟谈话，别把步子迈得太大。

有人心里敲小鼓。关金钟却心中笃定。对不对，看庄稼好不好就知道。

9月下旬，《人民日报》内参报道了吴桥县前郭大队“大包干”的消息。吴桥的做法得到了肯定。

听说山东的“鲁棉一号”产量高，他找到县供销社主任，用恳求的口吻说：“买种子的20万元，不跟群众要行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关金钟哽咽了：“我替全县的棉农谢谢你了。”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农民的积极性抑制不住地洋溢开来。

倒在心爱的田地里

要吃饭，就种棉。关金钟和千千万万吴桥人一起，想象着棉桃绽放满地雪白的景象，盼望着棉花大丰收。

1980年9月16日，在于集公社机关礼堂，县委召开全县联产计酬工作会，讲着话，关金钟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有人劝他：“关书记，你要保重身体呀，全县人民发家致富可都指着你啦！”“不要紧，我能顶得住……”布置完工作，他赶往麦田，察看秋收秋种情况。在麦田里，他脸色蜡黄，双眉紧蹙，豆大的汗珠往下滚，他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胸口……随即，他被送往县医院抢救，诊断为心脏病，终因医治无效，5天后，年仅56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为之倾注心血的这片土地。这一天，恰是农历八月十五。

这一年，吴桥县平均单产皮棉38公斤，首次达到全地区人均分配收入第一名。1981年单产皮棉达到51.5公斤，跃居全省第一。

关金钟去世后，吴桥当地的干部群众几千人自发冒雨为他送行。如今，在吴桥说起关金钟，很多熟悉他的人还不由自主地落泪唏嘘。

2018年，改革开放40年。吴桥县政协为纪念关金钟，出版《永远的记忆》一书。封面上，戴着眼镜、温厚笑着的关金钟，仿佛从未远去。

人们说，关金钟身上，不仅有焦裕禄一心为党为民鞠躬尽瘁的无私奉献精神，还有改革者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

肃宁籍著名三弦制作大师宋广宁逝世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5月10日，肃宁籍著名三弦制作大师、广宁乐器创始人宋广宁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7岁。作为我国著名的三弦制作大师，宋广宁在三弦蒙皮技术和共鸣箱（琴鼓）制作方面有着独到之处，经他改革后的三弦高音灵敏、清脆，低音浑厚，上下把位平均，工艺达到了高级水平，深得国内外演奏家的喜爱。

宋广宁，1934年出生于肃宁县西宋庄村，机缘巧合拜了“义和斋”的掌柜为师，从此与民族乐器制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公私合营成立北京民族乐器厂，宋广宁作为私坊人员，受邀任京胡组组长。1957年北京民族乐器厂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下3000把三弦的订单。宋广宁调入三弦组，按时完成订单的同时他开始与著名音乐家萧剑声教授合作研究改进传统三弦。1988年宋广宁担任组长的北京民族乐器厂三弦组获集体改革奖，被评为“全面优胜先进小组”，宋广宁、萧剑声研制的加强型三弦获评国家文化部教育局“文化科学技术进步奖”。经其研改制作的三弦作为权威的象征被刻以《萧剑声设计、宋广宁制作》的题款，成为乐器制作界老字号的标志。宋广宁也因此被冠以“三弦大师”的称号。

宋广宁制作的三弦，高音清脆，低音浑厚，反应灵敏，便于演奏，就连装饰用的葫芦头雕花都是精工细作，在业内堪称金牌。当时推广三弦琴的大型演奏会上，全部都是用“宋广宁制作”来演奏，得到了时任文化部领导的肯定，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报》都有过相关报道。